

梅 林

论文学



T106

40

2

梅 林

论 文 学

张玉书 韩耀成 高中甫 译

8286/24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B 007436

Franz Mehring
Aufsätze zur deutschen und
aussländischen Literatur

根据柏林迪茨出版社1963年版本译出

论 文 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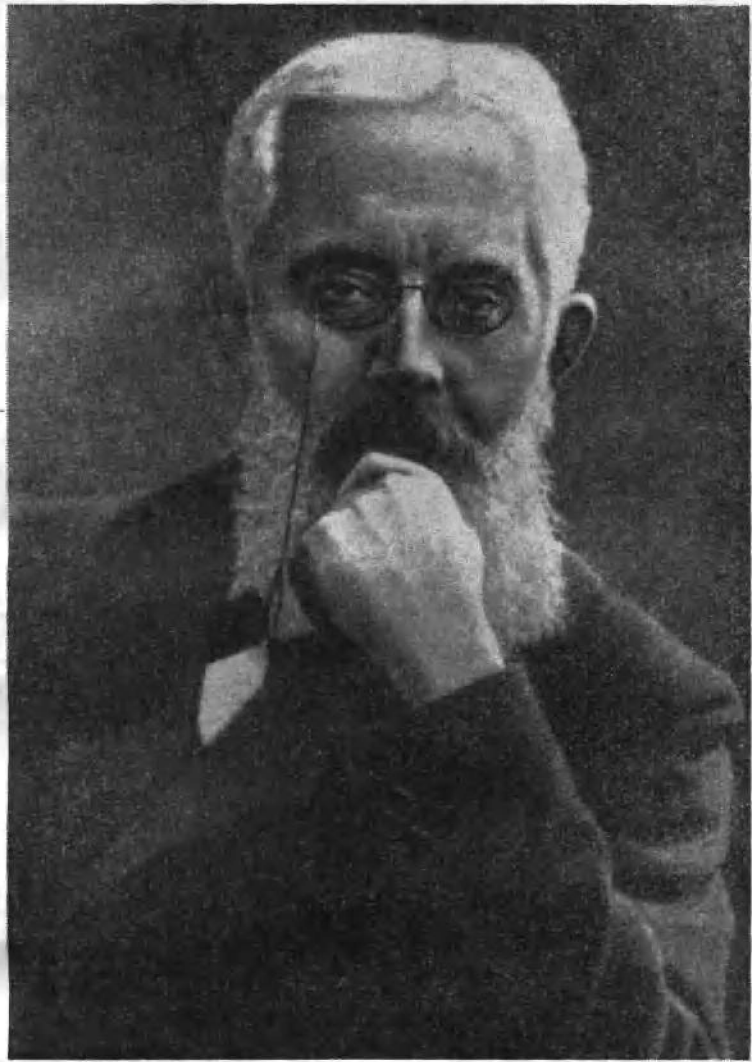
北京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6,000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3

198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0019·3357 定价 1.05 元



作者像

弗朗茨·梅林和他的文学批评

弗朗茨·梅林作为《马克思传》的作者，他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被列宁被誉为“不仅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和评论工作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斗的思想财富。他几十年间在党的报刊上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文章，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著作，而是他所承担的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跟德国无产阶级一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梅林是少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在论著中溶为一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永远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一

弗朗茨·梅林于一八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德国波美拉尼亚地方什拉夫城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家庭，从小受到传统的保守的普鲁士精神和宗教的教育。一八六六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在莱比锡大学(1866—1869)和柏林大学(1869—1870)学习哲学、历史和文学。这时正是普鲁士王国以俾士麦的“铁血”政策，自上而下统一全国，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情绪十分高涨。还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梅林，接触到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基多·维斯和约翰·雅科

比,参加他们主编的《未来》日报的工作,从此开始了政治活动和写作生涯。从一八六九到一八九〇年,梅林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的撰稿人,进而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期间他经历了迷误、失望、探索、追求,直至觉悟的艰难历程。早在一八七五年,梅林就和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开始合作,并撰文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特莱契克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然而他当时只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同情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他的目的是想把德国民主势力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反动势力,以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在一八七六至一八八〇年之间,他的超阶级的民主主义幻想使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相当尖锐的冲突,虽然后者本身的幼稚和软弱也是引起这一冲突的一方面的原因。但到俾士麦颁布《反社会党人的特别法令》(1878—1890)期间,梅林目睹德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同时经过他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深入研究,这个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毅然决然和他自己的阶级彻底决裂,开始成为德国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一名英勇善战的战士。

一八九一年梅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即为党的主要理论机关刊物《新时代》撰稿。梅林在党的刊物上写的大量政论,今天已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珍贵文献,而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写出的一系列出色的文艺论文,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梅林的如椽之笔不仅震惊了资产阶级,更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之胆寒。这些机会主义者拿梅林七十年代后期的错误大做文章,甚至在一九〇三年社会民主党的德累斯顿党代会上,企图把梅林开除出党。由于倍倍尔、蔡特金等人的坚决斗争,这一

阴谋未能得逞。梅林在他的书面发言中坦然承认，他在七十年代对工人运动确有错误认识，但是入党以来，“我没有写过一行不是党所要求的文字”。关于梅林的功绩，罗莎·卢森堡在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为梅林七十寿辰所写的贺信里作了中肯的评述：

……几十年来，你在我们这边，站在自己特有的岗位上。这个岗位，除了你，谁也占据不了；你是光辉灿烂的真正精神文化的代表。如果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继承人，那么你就是这一遗嘱的执行人。你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把过去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黄金宝藏里留下来的一切珍宝全都抢救出来交给我们，带到这些被剥夺了社会继承权的人们的阵营里来。通过你的书和文章，你用牢不可破的纽带，不仅把德国无产阶级同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同古典文学联系在一起，不仅同康德和黑格尔，而且也同莱辛、席勒和歌德联系在一起。你用出自你神妙笔端的每一行字，教育我们工人，社会主义不是个吃饭问题，而是个文化运动，是个伟大的、令人自豪的世界观。三十多年来，你的职务始终是捍卫这个世界观，并且坚守在它的岗位上。……今天，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背叛我们，为了回到统治阶级的宴席上去而离开我们，我们只好瞥他们一眼，报以轻蔑的微笑：你们尽管走吧！我们已经夺得了德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最富才智、最有天才、品德最高的最杰出的人物——弗朗茨·梅林……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反动派阴谋杀害。当时七十三岁高龄的梅林正卧病在床，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不胜悲痛，两周之后便溘然长逝，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崇高人格和卷帙浩繁的著作，其中包括四大卷文艺论文。

① 参见汉斯·柯赫著《弗朗茨·梅林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第9—10页，柏林迪茨出版社1959年版。

梅林作为文艺评论家，首先是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文艺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梅林撰写文艺论文，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帮助工人阶级透过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散布的重重迷雾，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从而更好地继承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

在人民群众被迫为生存而终日操劳的时候，艺术便成为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并不说明，人民大众不配享受艺术，不能欣赏艺术。关于这点，梅林在《歌德和现代》一文里有过深刻的论述：“人不能只靠面包为生，但也不能只靠艺术活命。在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之前，首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艺术就一直成为那些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的特权，并且这些人还引以为荣地铸出一种无耻的信条，认为群众从来不能经受住艺术的明亮的阳光，顶多只能经受住这种阳光的几缕暗淡的光束而已。只要还有统治阶级存在，只要被统治的群众不得不为起码的生存而搏斗，连吸口气的力量都腾不出来去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那种信条就能可耻地传播开去。”但是梅林深信，这种状况迟早要改变。到那时候，艺术不复为特权，而将成为全民的财富。“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日子，将成为盛会纪念歌德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的艺术将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①

^① 见本书第80—81页。

梅林几十年如一日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而努力。特别为了使德国古典文学为工人阶级所有，梅林进行了艰苦而胜利的斗争。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的开路人莱辛的“拯救”。从一八九二年二月起，梅林在《新时代》上分二十一期连续发表了评论莱辛的文章，这就是受到恩格斯热情赞赏和高度评价的文艺评论巨著《莱辛传奇》，以后他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莱辛剧作的论文。这些文章是在文学史领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典范，不仅从资产阶级“传奇”的思想迷雾中胜利地拯救了一直被歪曲的莱辛，而且为我们研究德国古典文学提出了科学的原则性的指导。

德国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早在一八四八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而在一八四八年以后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统治权的，所以决定依赖普鲁士的刺刀。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国百般美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不惜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歪曲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二世的崇拜者。这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编造“莱辛传奇”的真正背景。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笔下，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二世是个开明的君主，文艺的赞助人，他所进行的“七年战争”促成了德国古典文学的诞生，那么以莱辛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便自然是以歌颂“开明专制主义”为己任的宫廷文学了。梅林一针见血地指出：“畏缩胆怯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因而逃到普鲁士兀鹫的卵翼底下，同时也把自己最伟大**的历史荣誉**的称号，置于那兀鹫的‘旗帜的荣誉’下面。德国资产阶级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荒谬的传奇：一个普鲁士的暴君利用他的雇佣兵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从而使我们的古典文学

得以诞生”。^①

为了戳穿资产阶级学者所编造的这个传奇，梅林首先对弗里特里希二世及其“开明专制主义”进行了历史分析。他引用大量史料证明，这个口口声声自称为“国家第一公仆”、“真正乞丐的国王”、“穷人的国王”的弗里特里希二世，实际上是个残暴成性的专制暴君。他所统治的普鲁士是当时欧洲最野蛮的奴性最足的国家：密探遍布全国，人民噤若寒蝉；容克贵族享受特权，军队成为国家的支柱；军队和行政机关的大小官员均由贵族担任，市民阶级出身的人不得染指。弗里特里希二世只维护反动的容克贵族的利益，听任贵族出身的军官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同时任意克扣军饷，剥削士兵。军队道德败坏，士气低落，完全靠残酷的肉刑体罚维持军纪。尽管如此，逃兵的数目仍有增无减，士兵稍有廉耻心，不堪凌辱，以至神经错乱者大有人在。在《莱辛传奇》一书的《弗里特里希开明专制主义》一章的结尾，梅林写道：“这样一个开明专制主义和莱辛所开创的德国人文主义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这点大概不需要再予以证明，否则简直就多此一举了。在荆棘丛里是不可能长出无花果来的。”

弄清楚了这个历史背景，梅林接着明确指出：“我们的古典文学绝不是一个主要是文学的现象。它按照内在的实质而言，是德国资产阶级方兴未艾的解放斗争。”^②“我们的古典文学……表现为一个受到虐待受到压迫的阶级为自身的解放进行的第一次搏斗。”^③

德国古典主义的这一特性决定它不可能从普鲁士开明专制主义的“荆棘丛”中生长出来。但是，资产阶级学者不顾历史事

^{①②③} 见本书第29页。

实，硬把莱辛的喜剧《明娜·封·巴恩赫姆》说成是对弗里特里希二世和他进行的“七年战争”的颂歌。连歌德也有这种看法，他“在晚年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认为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和七年战争的业绩给德国文艺带来了第一个真正的本质的生活内容，所以他认为，必须‘很荣幸地提到’，《明娜·封·巴恩赫姆》乃是‘那次战争的最真实的产物’。”^①

针对这样一些看法，梅林指出：“今天，我们如不具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回想起这个国家当时的情景；这样一来，迎合时尚的谄媚主义便容易把莱辛的这出喜剧歪曲成对普鲁士军事国家或对弗里特里希国王的颂扬。可是如果我们要想按照莱辛的这出喜剧应该被人享受的那样享受它，那就必须从这种荒诞的妄想之中彻底摆脱出来”。^② 首先他分析了“七年战争”的实质：“七年战争就其历史形式而言，乃是欧洲一系列政府相互之间进行的一场内阁战争，老百姓除了担负费用之外，并没有怎么参与这场战争。再也没有比普鲁士国王更处心积虑地注意着不让这次战争具有任何民族性，任何人民性的了；他的原则是，士兵杀伐之际，市民不要过问……七年战争的这个历史特性完全排除了民族文艺会从这场战争里繁荣发展的可能性。”^③ 接着梅林便对这出喜剧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剧的故事是对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的政府的辛辣讽刺。剧本揭露“这个满脑子容克贵族思想的专制暴君，在战争失利困厄不堪之际不得已任命的一批出身市民阶级的军官，尽管英勇善战，只因为出身市民阶级，也同样被他撵出军队，而用外国的贵族来取而代之，那怕他们是帮道德败坏、极不可靠的坏蛋也在所不顾。”^④ 象

①②③④ 见本书第12, 13, 16, 15页。

剧中男主人公特尔海姆少校这样的市民阶级出身的军官，“在战争期间为国王打过仗，作过战，而在缔结和约之后，尽管伤痕斑斑，残疾在身，无法从事任何市民的经营，却被抛在街头。”^①

梅林就这样科学地戳穿了“莱辛传奇”，揭露了普鲁士开明专制主义的实质，使莱辛作为资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鲜明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使他的作品及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财富充分地为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所理解。不仅如此，梅林通过对莱辛遗产的科学分析，进一步把德国古典文学和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指出莱辛和德国其他伟大作家的文学遗产，当然只能由继续从事解放斗争的德国无产阶级来继承。

三

资产阶级学者就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所散布的传说，除关于莱辛的一种外，还有一种就是所谓“魏玛盛世”。前者歪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莱辛的形象，以达到美化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目的，而后者则为了美化封建德国的鄙陋状况。

一般文学史家向来以赞誉的笔触一味渲染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魏玛公爵的宫廷里如何“群星灿烂、英才毕集”，由此造成了所谓“魏玛盛世”的繁荣印象。似乎从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歌德应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之邀，来到魏玛公爵国担任国务大臣起，德国古典文学才开始了它的举世瞩目的辉煌阶段。在一般文学史中，卡尔·奥古斯特被描写成一位奖掖文学、庇护诗人的旷世英主，而在他的公国里，克洛卜斯、托克、赫尔德、歌德、席勒、维兰这些出类拔萃的诗人则不啻奥林帕斯山上的天神，仿佛

^① 见本书第15页。

生活在极乐世界之中，其乐陶陶，无比幸福。

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我们不仅应该赞美这位公爵，更要感谢德国当时由于封建割据、小邦林立而造成的鄙陋状况，它似乎是出人才、出成果的肥沃土地。然而，市侩哲学抹煞不了历史事实。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力，革命条件不够成熟，德国资产阶级的才智之士、先进人物，从来不能象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杰出人士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和捍卫革命的战斗中施展抱负，大显身手。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国诗人纷纷表示热烈欢迎，而当欧洲反动势力进行反扑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遁入哲学和艺术的领域，在缪斯的王国里去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免因颓唐沮丧，而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与其说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骄傲，毋宁说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耻辱。

梅林在《赫尔德》一文中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用批评的扫帚把人为地编织在魏玛‘繁荣岁月’之上的玫瑰红的蛛网扫除干净。”^①他自己身体力行，用他的文艺论文进行了这一清扫工作，使人看到了“魏玛盛世”的传说实际上掩盖了“鄙陋状况”的现实。

历史学家梅林为此把我们带到了魏玛公国，来看看德国的这座“奥林帕斯山”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那位“旷世英主”魏玛公爵又是个何许人物：

“整个公国总共三十四平方英里，居民约十万人，其版图并不见得比普鲁士的一个县或者几个县大，居然也拥有自己的宫廷和军队，自己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官厅，俨然也是一个欧洲强国；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小人国的尺寸，然而可怜的老百姓

^① 见本书第46页。

并未因此便少受压榨。”^①

“这位年轻的公爵并不是阿谀奉承的史家笔下描绘的那么一个思想高超的文艺赞助人。……公爵和歌德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之久，末了竟撤掉了歌德在魏玛剧院的领导职位，以满足他的一个情妇的瞬息万变的娇纵脾气。歌德当时就说：‘卡尔·奥古斯特从来也没有理解过我。’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②

梅林通过歌德在魏玛的经历和遭遇，说明了“魏玛盛世”的真实情况。在论述歌德的几篇文章里，梅林告诉我们，歌德在一七七五年初到魏玛时，还是抱着满腔希望，准备大干一场的。“歌德在魏玛度过的最初十年是一场‘为争取现实世界而进行的激烈的搏斗’。在他的心里，渴求政治解放的欲望也还生气勃勃，就跟在莱辛、席勒的心里一样。”^③他精力充沛地进行改革，颇想在这个小邦施展一下他治国的才能。“魏玛和爱森纳赫这两个公国‘始终是他试验一下世界角色究竟适合他到什么程度的一座舞台’。”^④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上下左右全是阻力。在他给封·斯泰因夫人的信里反映出他四处碰壁、十分绝望的心情：“我总是说，谁要是主管行政工作，自己却不是掌权的主人，那么这人不是市侩便是坏蛋，或者傻瓜。”^⑤他碰壁的最终原因乃是公爵不支持他。下面这句话既表现出歌德对公爵的批评，也包含着歌德的失望：“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时候也会在旱地上呆一阵。”^⑥于是梅林总结这一阶段：“在和丑恶可憎的东西进行的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中，歌德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所有的宏伟的创作计划都没有完

①② 见本书第57,56页。

③④⑤⑥ 见本书第88,89,91页。

成，搁置一边；……这时歌德断然决定，旅行意大利，以此自拔。”^①

歌德后来从意大利回到魏玛，已不再担任任何国家职务。这说明他对管理国家、改造社会已完全失望。既然得不到公爵的支持，改造社会无望，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也没有施展抱负的可能，歌德于是便遁入了美文学中。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人生目的，而是痛苦失望之余，退而求其次的决定。

歌德如此，席勒何尝例外。梅林在《席勒和现代》一文中引用席勒青年时代的朋友沙尔芬斯坦对诗人的评论：“力量的表现最使他（席勒——笔者注）心醉；如果席勒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话，那他在积极的公众生活中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②象席勒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热情正直，对封建暴政充满仇恨。倘若德国能有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舞台，他完全可以用火和剑去向封建制度冲杀，而不必在文艺领域内局限于摧毁“精神上的巴斯底狱”。^③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德国不存在这种“积极的公众生活”，席勒也不可能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一个伟人，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所以梅林下了这个令人痛心的结论：“我们的古典作家不得不局限于从事片面的美文学，实际上并不表示这些伟大人物臻于完美，而是表示他们日趋枯萎。”^④

由此可见，绝不能因为这些古典大师处于这种“鄙陋状况”之中依然作出惊人的成绩，而赞美这种“鄙陋状况”。所谓“魏玛

① 见本书第59页。

② 见本书第100页。

③ 参见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④ 见本书第88页。

盛世”实际上证明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不能有所作为；罩在“魏玛盛世”之上的玫瑰红的蛛网实际上掩盖不住“鄙陋状况”压抑人才、摧残人才的事实。莱辛和赫尔德“两人都在德意志小国专制主义的鄙陋状况下死于非命”^①，席勒死于贫病，歌德备受压抑。这种“鄙陋状况”是压在古典大师们头上的巨石，他们正是在石头缝里挣扎着成长起来作出成绩的。难道我们看到了大师们创造出来的古典文学的璀璨珍宝，便应该回过头去感谢那些压制他们的石头不成？梅林的文学评论彻底扫去了蒙在“魏玛盛世”之上的玫瑰红蛛网，不仅使我们看到德国“鄙陋状况”的悲惨现实和古典大师在困厄境地坚持创作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类似的文学现象的有力武器，便于纠正文艺批评中常见的从表面看问题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四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把作家放在他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分析，联系当时的阶级斗争，结合政治、经济诸种现象进行研究，不允许批评家凭借主观臆断，甚至主观好恶妄加褒贬，更不允许迎合时尚，趋附潮流，褒则肯定一切，贬则否定一切。梅林在一系列文艺评论中对古往今来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某些作家进行了或详或略的评论，基本上可以说立论公允、分析中肯，不但可以见出他拥有渊博的历史知识、高度的文化修养，更反映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掌握已经十分纯熟。我们不妨再以他对歌德和海涅的分析来作为范例。

歌德生前所受毁誉不一，既有人崇拜，也有人反对。可是到

^① 见本书第46页。

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歌德崇拜已经蔚然成风、人们往往容易对这位天才诗人全盘肯定。梅林充分看到歌德对德意志民族、对德国文学所起的巨大作用，充分评价了歌德作为天才诗人所作的杰出贡献。但是他同时指出，歌德受他出身的阶级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限制，自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错误。例如他初到魏玛时，实际上是作为一名廷臣，和公爵一起干些声色犬马的勾当，写些符合宫廷需要、迎合上流社会趣味的应景诗文。我们于是看到，这位写过《维特》、《葛兹》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作品的天才诗人还有庸人的一面。本文前面已提到歌德和其他古典大师在“魏玛盛世”中所受的压抑、屈辱和不得已遁入美文学的苦衷，这只是梅林对歌德的一方面的分析。梅林在有关论文中同时指出，诗人歌德出生于统治阶级，并在其中长大成人，他始终没有跳出统治阶级的魔法圈，他的高贵肢体始终没有摆脱德国鄙陋状况的桎梏。莱辛对于宫廷生活的强烈憎恶，歌德是没有的，他的缪斯差不多有六十年之久始终迁就着各式各样宫廷的要求。^①梅林在《歌德和现代》一文中还进一步分析：“这个环绕他的周围世界是狭隘的和可怜的，居住着驯从和胆怯的小市民，被一批渺小邪恶的专制暴君统治着。歌德就在这样一个小国暴君的宫廷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半时光，近六十年：这个暴君可能并不象其他暴君那样畸形，但他也决不因此而成为一个伟大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一切都在歌德的诗歌里打上了烙印，并且他年纪越大，其烙印也越深。”^②

歌德不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过反抗。他不辞而别，

① 见本书第 57 页。

② 见本书第 79 页。